

1978-2008

伟大历程

改革开放三十年

谢志强 等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8-2008

伟大历程

改革开放三十年

谢志强 刘能杰 陈 云 郭厚禄
朱攀峰 潘 嘉 谌 奇 李雄伟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伟大历程——改革开放三十年 / 谢志强等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 - 7 - 5438 - 5467 - 3

I. 伟… II. 谢… III. 改革开放 - 成就 - 中国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5173 号

伟大历程——改革开放三十年

谢志强 等著

出版人: 李建国

策 划: 章红立 李雄伟

责任编辑: 章红立 黎晓慧 洪江水

装帧设计: 陈 新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 / 16

印 张: 35

字 数: 518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5467 - 3

定 价: 88.00 元

营销电话: 0731 - 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总序

跨越世纪的起航

——从判断标准的变化看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历程

改革开放的30年，是思想大解放的30年。思想解放是一根大主线，思想解放到什么程度，改革开放就推进到什么水平。

30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可以平凡度过，也可以开创纪元，名垂千史。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的30年，是翻天覆地的30年，是民族振兴的30年，是创造历史的30年。这是民族复兴的30年，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6万亿元，比2002年增长65.5%，年均增长10.6%，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全国财政收入达到5.13万亿元，增长1.71倍。2008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完成3.4万亿元，同比增长33%，收支相抵还盈余1万亿元；外汇储备超过1.52万亿美元，经济跨上了新台阶。取消农业税，终结了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2007年产量达到5.015亿吨。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2007年进出口总额达到2.17万亿美元，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涌现出一批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科技创新成果，载人航天飞行和首次月球探测工程圆满成功。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7年达到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4140元。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初步形成，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上海特奥会成功举办……中国的综合国力在显著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在不断提高，中国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现代化事业在扎实推进。

30年，这是中国跨越世纪的起航，是民族复兴的起航。我们在问，世界在问，是什么原因成就了这样的奇迹？我们认为，成就中国发展奇迹的是改革开放，它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这场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两亿多人。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毫无疑问，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开启中国改革开放并不断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首要因素、主要动力是一次次伟大的思想解放，是不断的与时俱进。解放思想的核心是我们的观念变了，是看待世界的方式变了，其中主要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判断事物的标准变了。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科学发展观的确立，记录的是一个民族前进的步伐，记录的是中国发展深处最本质的东西，必须好好总结，这是一笔可以留存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继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笔者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历了四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其主要标志是提出了四个新的判断标准，我们将前三个概括为“一个标准”、“三个有利于”、“两个一切”，后一个是科学发展观。“一个标准”，即1978年5月开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三个有利于”是指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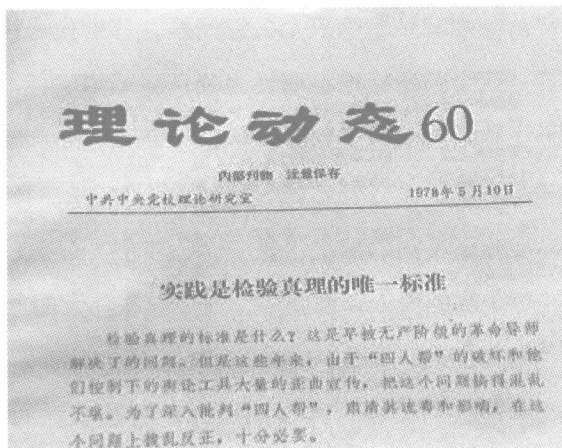
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判别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两个一切”是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来的，即“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

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三个标准代表三个方面、三大领域，科学发展观是一个总的综合性的标准，因此，四次思想解放也可称作“三分一总论”。新标准、新尺度给人们带来了新观念、新思路，给改革带来了新动力、新气象，给社会带来了新变化、大发展。

一、思想大解放是改革开放的先导

用什么样的方法分析事物，用什么样的标准判别是非对错，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用一种过时的僵化的公式、标准、尺度，去剪裁、评判新的实际，就会犯下严重错误。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之所以仍在继续向前推进，之所以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解放了思想，放开了手脚，在充分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与挫折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把自己从本本和框框中拯救了出来。毫无疑问，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而没有发动起来并排除万难坚持下去的改革开放，也就没有思想解放的进一步深入，思想解放的巨大影响力、号召力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成为全国人民继续前行的共识。因此，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中国人民不断进行思想解放的30年。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推进改革开放的先导工程。

我们先来分析前面的三个判断标准，看它们是怎样从本源上推动思想解放和社会发展的。三个判断标准内容不同，分别属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范畴，它们在关键时刻解决了“真理标准”、姓“资”姓“社”、“姓



1978年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公”姓“私”等三个关键问题，分别代表第一、二、三次思想解放的最核心内容。三个判断标准在属性上分别属于事实标准、价值标准、性质标准，由此产生了三种判断：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和性质判断。它们具有不同的功能，分别解决“是不是”、“好不好”与“对不对”的问题，但彼此间又密切关联。三个判断标准分属不同的层次，是一个逐步展开深入的过程，它既继承前人又不断开拓，在每一次的深入和创新中，完成一次伟大的创造和对自身的超越。

上述三个不同内容、不同方面的判断标准，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提出来的，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是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彻底纠正过来，把他们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彻底粉碎。如果没有这次大讨论和这次大讨论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就不会有思想的解冻，就不会有随之而来的一场伟大革命——改革开放。因此，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在此问题上形成的共识、认同，对于打破当时发展的僵局，对于启动改革开放，具有先导作用、开路作用、突破作用。“三个有利于”是针对1989年下半年开始且愈演愈烈的“左”倾思潮提出来的。面对“六四”风波后在姓“资”姓“社”问题上一系列的质疑、纠缠，面对一些人用姓“资”姓“社”来否定改革的危险倾向，面对着重走回头路的可怕后果，1992年1—2月，已是88岁高龄的邓小平毅然南下视察，他用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总设计师的过人胆识，发表了一系列震撼人心的科学论断，其中用掷地有声的科学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解决了困扰我们多年的难题，结束了姓“资”还是姓“社”的无休止的争论。从此，陷入困境的中国改革开放又似大潮，再次汹涌澎湃起来。“两个一切”主要是针对在所有制问题上的姓“公”姓“私”提出来的。随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步伐的加快，1995年对姓“公”姓“私”问题的争论到了异常激烈的程度，实际上，该问题是原有姓“资”姓“社”问题的进一步展开。在当时，所有制问题是邓小平留给人们的一道尚待解决的难题，在澄清了姓“资”姓“社”的疑惑后，姓“公”姓“私”的问题成了困扰人们思想、束缚人们手脚的主要障碍。很显然，这是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想的再次回潮，是对改革开放发动的新一轮攻击。为了冲破这种阻力，为了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推



党的十五大提出“两个一切”。

向前进，1997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和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上，对处在关键时刻的中国改革，毅然决然将改革的方向、重点直指所有制，并对传统的公有制理论作出重大修正，从而在极其敏感、极为复杂的所有制改革问题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这是党的十五大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方面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它用“两个一切”解决了我们在所有制形式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方面多年难以启齿而又必须解决的难题。“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和多样化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两个一切”标准对于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对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对于更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对于带动改革、发展全局都将产生极其深远、极其深刻的影响。而且，时间越久远，影响越巨大。因此，以“两个一切”为主要标志的所有制改革，就必然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的主要里程碑，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

解放社会，先要解放人。社会是在不断解决各种矛盾和冲突中前进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这就需要我们积极地认识和探索，去不断地开拓、创新。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只能丧失历史发展的机遇，更谈不上抓住机遇和创造机遇。以高昂的、进取的精神状态面对火热的现实，面对未来，是我们应当努力提倡并保持的一种风格。无论是“一个标准”、“三个有利于”，还是

“两个一切”，它们作为一种全新的尺度、全新的方法、全新的分析手段都充分体现了这样一些特点，它给我们评判事物、解决问题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观念、全新的思路，使社会发展出现了崭新的气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因此，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有一种发展的观念，面对任何事物都应当有一种创新求变的意识。思想解放是先导，是我们践行的动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先导的思想解放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巨大的工程，对于任何事物和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来说，无论是思想解放的内容，还是其方式、方法，都不是单一的，它与整个社会系统密切关联，涉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谈思想解放，应当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单纯指某一方面或某一个时期。不同的是，随着情况的变化，每一时期思想解放的重点、内容会有所不同。当思想解放的内容、对象、力度不同时，触及的层面、影响的程度也会不一样。“一个标准”、“三个有利于”、“两个一切”都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提出的，所指对象已成为多种社会矛盾的焦点，只有在此打开缺口，才能打破发展的僵局。科学的新标准新尺度的建立，带来了新的思想解放，起到了打破僵局、带动全局的特殊作用。

二、判断标准的多维视角分析

“一个标准”、“三个有利于”与“两个一切”之间既有明显的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彼此间不同的地位、作用以及由此形成的互补和层层递进关系，使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不断向纵深推进又横向扩展的中国思想解放的伟大进程。下面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对此加以分析。

1. 判断标准的学科分析

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解决了三个不同方面的重要问题，其理论和实际依据来自于三个不同领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是从哲学，特别是从认识论的高度为思想解放扫清障碍。哲学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是人类思维的最高层次。当人们的思想被普遍压抑、封冻的时候，从认识的最高层次上选择某一方面作为思想解放的突破口，无疑具有牵动全局的作用。社会是靠人去推动的，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他有思想。只有被先进的、科学的思想武装

起来的人，才有资格成为思想解放的先锋，才能带领中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富强之路；只有被先进的、科学的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才能勇敢无畏、实事求是地去做好各项工作，去开创生机勃勃的新局面。然而，思想、认识正确与否靠什么去检验？用本本还是用实践，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困扰中国的最主要问题。选择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一属于哲学领域的问题作为突破口，抓住了要害，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三个有利于”标准，主要从科学社会主义角度解决了当时出现的姓“资”姓“社”的新难题，为新一轮思想解放打开了通道。我们知道，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地回答并成功地解决了科学社会主义中两个最基本的、也是首要的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根本标志。在这里，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论断是非常精练的、原则的和抽象的。那么在实际操作中我们怎样判别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非社会主义呢？这就要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三个有利于”是社会主义本质的细化、具体化，它把大力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全民族的共同富裕作为自己最终的奋斗目标，二者是有机统一的，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可以认定：“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为思想解放打开了又一个新的通道。“三个有利于”标准在这个时候提出来，也是历史的必然。思想已经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面对着旧体制不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理所当然地要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是不是在干社会主义？这是认识上的一种从自在到自为的表现，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人们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扫除思想阴霾后迎来的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春天，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贡献。

“两个一切”的标准，是针对甚嚣尘上的姓“公”姓“私”问题提出来的，也就是针对所有制问题提出的。因为第一个“一切”解决的是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的问题，第二个“一切”解决了什么样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为我所用的问题。显然，第二个“一切”是第一个“一切”的进一步展开，只有当事关全局的所有制的形式问题解决以后，再来论及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

化问题，才有了可靠的前提和切实的基础。所有制问题是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改革攻坚中一个最敏感、难度最大的问题，也是改革深化过程中一个必然会触及也必须解决的难题，不能回避。“两个一切”标准的提出，是在改革攻坚的关键时刻，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冲破姓“公”姓“私”的阻力，从政治经济学层面为再一次的思想解放打开的又一个崭新通道。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的认识统一后，才能凝聚起全国人民的意志，才能齐心协力去实现我们既定的现代化目标。

我们知道，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解决了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三道重要难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三道重要难题的解决也使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获得了新的血液和生命力。三个判断标准成为了三次思想解放的后盾和强大支持力量，也分别成为了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和组成部分。从哲学到科学社会主义，再到政治经济学，一次次的深入，一次次的开拓，实现着一次次的发展和一次次的超越，我们从中感受到了中国胜利前进的脉搏。

以上分析，可用下图作一扼要概括：

- a. 哲学→认识论问题→“一个标准”
 - b. 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三个有利于”
 - c. 政治经济学→所有制问题→“两个一切”
- (→表示问题的层层推进和认识的不断深入)

上图表明，三个不同的判断标准反映了三个不同方面、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问题，由此形成了三个突破点。三个判断标准的理论源头来自于更高层次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2. 判断标准的属性分析

判断事物标准的分类是多样的，从其属性来看，主要有事实标准、价值标准和性质标准，由此产生出三种不同的判断，即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和性质判断，它们分别解决三个不同方面的问题，起着不同的作用。事实标准和事实判断主要解决“是不是”的问题，价值标准和价值判断主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性质

标准和性质判断主要解决“对不对”的问题，这些作用与真、善、美的功能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用这三个判断标准来判别事物将会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和权威性。以上分析可表示为：

a. 事实标准→事实判断_{解决}→“是不是”←真

b. 性质标准→性质判断_{解决}→“对不对”←善

c. 价值标准→价值判断_{解决}→“好不好”←美

根据上面的分析思路和理念框架可知，实践标准属于事实标准，用作事实判断。实践是用来检验真理的，真理是一种认识，正确与否，在于它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本质。那么如何来确认这一反映的客观性、真实性和科学性呢？主要是看人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这种主观上的认识、反映和客观的实际效果是否一致。如果是一致的，说明我们的认识以及由此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所以，它解决的是事实上的“是不是”问题，认识上的“真不真”问题。实践标准的确立为我党制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个有利于”标准属于性质标准，是判别是非得失的标准，主要用作性质判断，但又内含一定的价值判断。无论是认识也好，实践也好，我们所有的动机，所做的任何事情，到底“对不对”，必须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去判断。例如，股份制作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不可以用，用了对不对？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股份制有利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像市场经济一样，股份制也是属于中性的东西，它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这是第一。第二，“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在实践标准基础上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入。因为如果单纯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认识的正确性，还显得非常原则和抽象，究竟是用实践的过程去不断检验，还是用实践的结果来检验，实践本身又怎样去量化呢？而且有些实践到底该不该进行，有没有必要去做，必须搞清楚。要解决好这类问题，就必须对认识和实践本身作出“对与不对”的性质判断，其衡量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只要符合这“三个有利于”的就是善的，就是对的。因此可以认定：事实标准是性质标准的基础，它严格规定我们必须用事实来说话，要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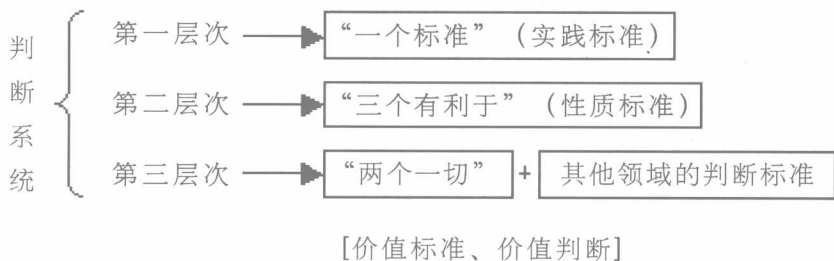
事求是，决不能主观判定；同时，性质标准、性质判断又是事实标准、事实判断的进一步展开、深入和具体化，它使我们可以更准确、更科学地进行操作，能真正使认识和实践朝着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的方向进行，而不是相反。

“两个一切”的标准主要属于价值标准范畴。价值标准是人们的一种主观认定，是看客观对象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即看对象对主体有没有价值、有没有用。如目前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一个新生事物，它的产生自有其必然性，在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许多不完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只要它在大方向上、在功能的发挥上符合“两个一切”的原则，就要积极地支持和引导，使之更规范，更具生命力。必须注意，作为价值标准的“两个一切”是以作为性质标准的“三个有利于”做基础的，是性质标准的进一步展开。这是因为：在“两个一切”中不仅重申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充分体现了在检验标准上的前后一致性，而且将这一标准具体运用到对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上，使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更加突出，目标更加明确。与此同时，它从所有制角度也使我们进一步深化了对“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再认识。因为在解决了姓“公”姓“私”的标准问题之后，无疑可以对姓“资”姓“社”的问题作出更深刻的分析。在性质标准的基础上来谈价值标准，在“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基础上谈“两个一切”，可以使我们牢牢把握发展的大局、发展的方向，能使我们始终如一地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正做到把握机遇而不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因循守旧，从而不断加大改革力度，在改革的各个部位和重点环节上，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上不断实现新的突破。

3. 判断标准的层次、特点分析

作为哲学领域的实践标准是最高层次的标准，它统率一切，判断一切。作为性质判断的“三个有利于”是第二层次的，它是实践标准的进一步具体化，具有全面性、深刻性、系统性、科学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全面性体现在所有一切事情的是非得失都要以此为标准，而不能有其他的标准；深刻性体现在我们把“三个有利于”作为根本判断标准，其他一切标准都是非根本的；系统性、科学性体现在“三个有利于”的内容无论在涵盖面上、顺序排列上、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上都讲得非常周全、合理、科学；长期性体现在该标准绝不是权宜之计，在整个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甚至更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将起作用。它是我们开创新局面，澄清是非，防“左”反“右”，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绝对不可缺少的。在这个意义上，该标准同样具有全局性的作用，但比实践标准要具体，操作性要强。主要作为价值判断的“两个一切”，属于第三层次的标准，它是针对经济体制改革领域里所有制的问题提出来的，是具体学科领域中一个具体的判断标准。由此推论，在其他学科和其他相对独立的部门与领域里，也可以而且应该提出与之相适应的判断标准来。在标准探索领域留下的这些尚待填补的空白，给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它需要我们更进一步解放思想，拿出新的成果来，逐步建立起一个新的科学的标准系统和评判机制。至于这些标准是否科学、合理、有效，必须接受两个检验，一是它必须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二是要接受实践的裁决，用事实说话。以上关于标准的层次分析，用图表示如下：



4. 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与贡献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作了五个定位，认为它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发展应该是科学的，怎样才能做到科学发展呢？在这个问题上，古今中外的有识之士进行了很多探索，特别是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种种“工业病”、“城市病”，使人们越来越关注发展的方式、发展的思路问题，相继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发展理论，如经济增长论、增长极限论、

综合发展论和可持续发展论。从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来讲，20世纪50—60年代由刘易斯、帕森斯、索普赛特等人提出了现代化理论；20世纪60年代由普雷维什、弗兰克等人提出了依附理论；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由沃勒斯坦等人又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都或多或少地推进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在历史上留下了烙印，但它们都有历史的局限性，都存在某种缺陷，特别是未能解决好协调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是科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强调要实现以人为本的目标，必须首先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搞好五个统筹。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从判断标准的角度来分析，2003年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后来又不断完善的科学发展观，既是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

“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成果，又是重要指导方针和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同时也是检验和判断事物的标准。这个标准带有综合性、根本性和系统性。其综合性体现在：前面提到的

三个标准是具体的分方面的，科学发展观是总的标准，是判断标准中的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框架，它综合了前三个标准的内容并使它们成为一个完整的评价系统。其根本性体现在：人是发展的核心，人是发展的根本出发点。人是否得到了发展，这是根本的评判标准。发展是为了人，发展不能忘记人。人的自由和发展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其系统性体现在：用科学发展观评判事物时，既强调了发展的要点，发展的出发点，也强调了发展的途径和要求；既明确指出了发展的内容，又明示了“统筹兼顾”这一发展的根本方法；既强调要素的重要，也肯定彼此间协调配合的不可缺少。这些不同的侧面

三个标准是具体的分方面的，科学发展观是总的标准，是判断标准中的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框架，它综合了前三个标准的内容并使它们成为一个完整的评价系统。其根本性体现在：人是发展的核心，人是发展的根本出发点。人是否得到了发展，这是根本的评判标准。发展是为了人，发展不能忘记人。人的自由和发展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其系统性体现在：用科学发展观评判事物时，既强调了发展的要点，发展的出发点，也强调了发展的途径和要求；既明确指出了发展的内容，又明示了“统筹兼顾”这一发展的根本方法；既强调要素的重要，也肯定彼此间协调配合的不可缺少。这些不同的侧面

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只要我们稍加具体化，就能成为我们多角度评判一个事物的科学标准，具有十分重要的操作价值。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是科学的发展观，一是它遵循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没有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同时又密切注意到了中国发展的差异性，是共通性与差异性的统一。二是它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为本”很好地结合起来了。科学发展观首先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课题，而且发展首先是经济的发展，胡锦涛同志指出：“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为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为全面协调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才能更好地解决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和问题。”三是它把发展的目的与手段和途径很好地统一起来了。在理论创新的指引下，我们要很好地挖掘它的内在价值并不断丰富这一理论。从判断标准来理解、细化科学发展观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尝试。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提出之所以是一次很重要的思想解放，是因为它要以巨大的勇气否定那些有很大影响但不合时宜且被实践证明有重大缺陷的发展观，这就特别需要解放思想，要从教条中解放出来，从权威中解放出来，从重重压力中解放出来。在继承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最终使之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一个观点、一种理论的提出，能不能成为一次思想解放的标志，还要看它是否有力推动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大转变，是否有力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大变革大发展。自2003年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以来，它已经为人们所理解、所接收，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巨大力量，它能够承担并且已经承担起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

5. 几点归纳

从“一个标准”、“三个有利于”、“两个一切”到科学发展观，是一个逐步展开和深入的过程，它反映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前面三个重要的不同判断标准解决了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三个关键的问题，即真理标准问题、姓“资”姓“社”问题和姓“公”姓“私”问题，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发展观是我们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情况，深刻把握我国发展趋势而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和重要战略思想，具有很强的综合性；

前三个不同的判断标准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标准体系，即事实标准、性质标准和价值标准，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不可相互替代。系统性的科学发展观整合了前面三个标准，使之成为一体；各判断标准各自起着不同的作用，不同的判断标准处在不同的层次上，有明显的区别，也有密切的关联，操作时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可混淆；科学发展观不能替代也没有必要替代“一个标准”、“三个有利于”和“两个一切”。它们的作用点是不一样的。判断标准的变化反映了人们观念的变化，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也真实地记录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风雨历程。每一次科学的重要的新的判断标准的提出，都是中国社会大发展的一次印证，都是一次宝贵的突破和创新。只有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基础上用新标准、新方法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才能不断开创新视野，获得新发展，进入新境界。

以上总结归纳的内容，其中几个主要的基本观点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用下图表示：

